

# 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的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植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现实土壤，承继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历史大逻辑，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今刊发三位学者的文章，以期引起对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思考。

## 中国经验具有取之不尽的经济学元素

周文

在过去3000年人类历史长河中，从史诗意义角度看，只有4个事件可以和中国崛起相提并论：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917年的俄国革命，19末期20世纪初的美国崛起。前面两个事件影响了19世纪的世界秩序；后面两个事件塑造了20世纪的世界格局。而中国的崛起将成为近300年来世界历史上的第五个大事。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来说，中国崛起有两层含义：一是意味着300多年来由西方中心论主导的经济学时代即将结束，也意味着中国成为经济学中的西方概念“搬运工”、西方学术话语“跑马场”的时代结束。现代西方经济学是西方经验的总结，近100多年来，不仅经济学，而且整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一直笼罩在西方中心论的霸权话语体系下，而中国的崛起解构了西方话语体系。二是世界发展巨变和新格局，暴露出西方经济学解释力的日渐式微和体系的自相矛盾。因此，未来30年，随着中国经济再次重返世界中心，世界正在迈入经济学的中国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正逢其时。

### 中国经验提供了丰富元素

今天“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已成为举世瞩目的话题。理论是实践的反映。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带来理论的繁荣与兴盛；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必然要求在经济学理论和体系上体现出来。否则，中国经验与中国奇迹将停留在经验层面和碎片化状态，难以上升到理论高度，也就难以得出规律性结论，最终必然失去指导意义。因此，在正视中国发展经验的同时，必

须对“中国道路”、“中国经验”进行全方位多维思考，进而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的理论诉求。在这方面，恰恰是国内的一些学者反而不及某些西方学者清醒，忘记经济学正在迈入“中国时代”，仍然在用西方话语来讲述中国故事，机械甚至固执地认为现代经济学只能是西方经济学。事实上，中国发展的经验有着丰富的内涵和更加多维的层面，具有取之不尽的经济学丰富元素，远远超越西方理论的内涵和指导意义。

其一，中国道路丰富了对现代化的认知，突破了传统现代化的路径，体现了推动人类发展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经验证明，现代化并非是西方化，现代化模式也不是唯一的，而是多维的。

其二，中国对西方的发展超越，其本质是中国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对西方的超越。历史上中国从秦汉开始的以郡县制代替封建制，完成了在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上对西方的第一次超越，才确立了后来中国在1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对西方发展的遥遥领先。今天，作为21世纪的中国在发展上再次实现对西方的超越，表明西方面临的危机不仅仅是发展的危机，更是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危机。

其三，中国经验不但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一方面，中国发展实践对世界经济增长和减贫作出了70%贡献，使得今天的世界变得更加公平；另一方面，中国经验更符合发展中国家的探索，相比西方提供的发展模式，中国方案更具有普适性和认同性。

因此，只要坚持将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中国发展道路作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的源泉，立足中国国情和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理论学说，就可以尽快地做到和完成中国发展优势到理论优势再到话语优势的三个层次递进和转换。

### 概念范畴创新与理论创新

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赢得了世界的认可，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存在着重西方经济学，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倾向，从而导致不少学者对西方经济学的“迷信”和“崇拜”，妨碍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立思考 and 理论创新能力。这种格局和状况，容易使我们丧失理论自信，甚至掉入西方经济学理论和西方话语体系的陷阱之中，从而误判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与概念范畴创新是分不开的。首先是概念范畴的创新。没有标识性概念和范畴，经济学就缺乏主体性和自信力，更容易陷入西方话语体系的陷阱。中国的崛起对西方概念形成了挑战，中国的崛起和对西方的超越使得西方的概念和学说越来越难以对中国问题提供准确解释。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面临的任务是，不但要解构经济学的西方中心论，更重要的是对经济学的西方概念进行“术语革命”，进而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术语“创造性”重构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逻辑体系，为世界经济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特色。

其次，理论的创新。回顾中国30多年的诸多改革，不少是源自于下而上的实际经济操作者的行动，然后被中国的经济学家总结发掘，最后以某种在西方经济学看来无法理解或似乎不严谨科学的词语，不断被中国最高层决策者采纳，在经不断试验和“试错”，进而以更直白和朴素的语言形成权威的改革文件最后向全国推进，形成改革浪潮，取得改革的成功。比如，家庭联产承包制、价格双轨制、所有制结构理论、收入分配理论、经济发展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正是这些在西方经济学里很难搜寻的中国词汇和中国理论，实际上成为中国经

济改革不断推进的导火线，从而不断深化中国30多年的经济改革，推动形成了中国经济的奇迹。

现在总结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在理论上最大的贡献，第一个是提出了发展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也就是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这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深化，体现的是对发展理念上的突破和贡献的中国智慧，更可能成为引领未来全球发展的新理念。第二个是先富后富与实现共同富裕。在整个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实践一直伴随着对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的重视和不断出台对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的解决举措，只是在每一个进程和阶段，可能具体的措施、侧重点有所不同。回顾中国对扶贫和减贫的实践，中国对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的理解和实施举措，应该说是对方理论的超越，它破除了人们简单化认识的两极分化概念。从中国的发展实践推进来看，中国的收入差距拉大问题不是一个两极分化现象。从过去的历程看，中国对全世界的减贫做出了70%的贡献，从而使世界变得更为公平。第三是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对西方理论的超越就在于对市场和政府关系的认知。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不断改写西方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屡屡误判，成功地走出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今天来看，中国经济的奇迹和成功，应归功于经济体制改革中始终坚持政府与市场的两点论、辩证法，注重两者的有机结合，而不是简单地推行市场自由化。中国改革与发展自始至终抵制着“华盛顿共识”的“正统经验”，寻求适合本国的发展路径。中国改革发展的成功，实质是对西方经济学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颠覆和重构，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现。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

##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两大理论来源

孟捷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两大理论来源，其一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即以《资本论》为代表的经济学，它是我们构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思想来源。其二是其他各种新兴政治经济学，国外称之为异端经济学。

最近一段时间，在跟大家汇报我的个人思想的时候，我经常喜欢用一个比喻，即经济学像是一幢三层楼的建筑，这三层楼代表了从抽象到具体的分析的不同层次。第一层楼是纯理论的研究，这些理论涵盖了在中国高校中有较大影响力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以及演化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等影响力相对较小的范式。在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以外的理论范式往往又被统称为异端经济学，对应于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我则愿意采用另一个称谓，把所谓异端经济学统称为新兴政治经济学，其理由后文还会谈及。经济学的第二层楼是历史制度分析，包括对中国模式和中国发展道路的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主要贡献集中于此。第三层楼则是政策研究，例如适度从宽的货币政策之类的研究。

在我看来，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何建立，这个问题也可以运用三层楼的隐喻来加以考察。首先，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明确自己的理论来源，或范式的基础，就必须在第一层楼里进行选择，是选择新古典经济学？还是选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否还要考虑选择一些异端经济学的理论？等等。进行这种选择就提出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问题。列宁曾提出马克思主义有三大来源和三大组成部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在类似的意义上面临其理论来源的问题。在我看来，它有两个来源，其一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即以《资本论》为代表的经济学，它是我们构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思想来源。其二是其他各种新兴政治经济学，国外称之为异端经济学。

###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长处，是它提供了有关市场经济的“病理学分析”，即对它的内在矛盾的分析。在经济思想史上，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分析是迄今为止所有理论中最深刻的，凯恩斯也受到这一分析的影响。马克思自然对这一理论做了主要贡献，但后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乃至其他异端经济学家对于这一理论也有重要的补充和发展。我想在此采用一个简要的表述，来概括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病理学”分析，即将其概括为有关三种市场及其内在矛盾的理论。

第一个是普通产品的市场，马克思用由两大部类构成的再生产表式概括地表达了这一市场。在这个市场上，存在着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这个观点经过卡莱茨基的中介，为凯恩斯所采纳，后者采用另一套话语对这个矛盾做了新的表达，即将其表达为产品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然而，和马克思不同，凯恩斯不仅要谈病理学诊断，而且要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开药方。在《通论》的最后一章，凯恩斯系统地论证，在一个完全由私人主导投资权力的市场经济中，有效需求不足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必须由社会接管一部分投资权力。第二个市场是所谓“生产的条件”，或集体生产资料和集体消费资料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上，由于投资的结果缺乏可独占性，收益的不确定性较高，如果由私人资本占主导的话，将会造成供给不足的矛盾。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奥康纳，将此称作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第三个市场是金融资产市场，这一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与普通产品市场的矛盾相关。因为有效需求不足，资本出现过剩，所以资本会在金融资产市场上寻找投资机会。然而，投资于金融资产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如果所有人都想在这个市场牟利，那是不可能的。大资本的游戏秘密在于，利用制度性权力，在金融资产市场创造出大卫·哈维所说的阶级—垄断租金，以吸引玩家加入这个游戏，因此，泡沫的发展，是这个市场得以繁荣的内生性条件。现代资本主义，尤其是美国资本主义，在1980年代后尤其依赖于这一市场的发展，后者

往往被称作金融化，它的出现以及由此带来的金融危机的频频，是市场经济的第三重矛盾。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明斯基对第三个矛盾也有很深入的分析，他的分析可以与哈维等人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相结合。

如果我们和新古典经济学相比较的话，就会发现新古典经济学对上述这些矛盾是在不同程度上回避的。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市场经济是内在地协调而稳定的。新古典经济学完全忽略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是一个具有纯粹辩护论性质的理论。从这个角度来讲，新古典经济学尽管是最为流行的当代经济学理论，但它显然不能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来源。与新古典经济学相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深刻地剖析了市场经济的结构性矛盾，认为从无数人分散决策出发会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甚至导致经济的崩溃。

### 当代新兴政治经济学

在构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还有没有其他经济学范式可供借鉴呢？这里就要谈到当代新兴政治经济学，如演化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斯拉法主义经济学等等。在我看来，以演化经济学、后凯恩斯经济学等不同理论为代表的当代新兴政治经济学，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第二大理论来源。当代新兴政治经济学也可以称为当代古典经济学。古典和庸俗之分是马克思当年的一个分法，马克思向伟大的古典经济学家（配第、斯密、李嘉图、西斯蒙第等等）学习，从他们那里汲取了营养，形成了自己的理论。正是在此意义上，列宁将古典经济学列入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之一。马克思认为，1830年代以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丧钟被敲了，从此以后就是庸俗经济学当道。这个判断对于19世纪中叶的形势而言是正确的，但不能教条地运用到今天。我们今天其实和马克思当年一样，既面临着当代西方庸俗经济学，也面临着当代西方古典经济学，后者是应该学习和借鉴的。因此，笼统地将“西方”经济理论排斥在外，是不正确的，在策略上也是愚蠢的。那么，谁是当代古典经济学家的主要代表呢？这里我想提到诺奖得主、美国学者斯蒂格利茨，他在苏东巨变后曾写了本书叫《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猛烈批判。他在书中提出了不少振聋发聩的观点，例如，他指出，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并不是一个关于经济市场的理论，而是关于计划经济的理论；他还提出，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核心模型，所谓阿罗—德布鲁模型，是从根本上排斥创新的，且不可能经过任何修改引入创新。斯蒂格利茨不仅批判新古典经济学，还经常批判“华盛顿共识”。这样的经济学家，理所当然属于当代西方古典经济学的行列，他们的理论是我们构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来源之一。

正如上文提到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病理学分析揭示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当代西方古典经济学或当代新兴政治经济学家对这种病理学分析有一个重大的补充，这体现在，他们一方面承认马克思所揭示的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另一方面，和马克思不同，他们认为这些内在的、导向非均衡的趋势有可能被协调，而不是导致整个体系立刻被炸毁。在理论上，实现协调的途径大体分为两条：即通过创新来协调，以及通过制度来协调。强调创新的协调意义是熊彼特的贡献，强调制度的协调意义是凯恩斯的贡献。当代演化经济学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继续推进了对相关问题的研究。除了这些研究外，我们还可以增添两个人，即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和社会学家波兰尼，他们也从各自角度研究了协调的问题。总之，当代西方新兴政治经济学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样，是我们构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两大理论来源。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基本属性

黄泰岩

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自信，源于其所具有的科学性、继承性、包容性和创新性。深刻阐述这些基本属性，就成为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关键，也是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是否能够指导我国经济稳中求进，实现“两个一百年”发展目标的关键。

### 科学性

科学的理论来自成功的实践，并在成功实践中得到检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就是从中国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中总结提炼出来的，并通过创造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国奇迹”得到验证。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形成了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分配制度，取得了巨大的制度红利；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确立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推动了市场经济的理论创新，形成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主线，以稳中求进为总基调，引导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发展。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看，只要坚持稳中求进这个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和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能够保持年均6.5%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可以如期在2020年实现GDP总量和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达到全面小康的发展目标。如果能够继续保持13年左

右的稳增长，我国按汇率计算的GDP总量就可以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人均GDP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从而用新的成功实践进一步验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科学性。

### 继承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还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是与科学理论一脉相承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一再被证明是科学的理论，特别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更加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强大活力和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与中国改革发展的实践相结合，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境界。突出表现在：一是针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弊端，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就是对马克思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规律的继承和发展；二是针对在一穷二白的旧中国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的继承和发展；三是针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的多层次性和复杂性，把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确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就是对马克思公有制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四是针对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自主创新的不足，把创新驱动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就是对马克思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继承和发展；五是针对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的不同协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的重大结构性矛盾，把协调发展作为指导经济发展的新理念，就是对马克思两大类平衡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 包容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还是建立在世界各种经济学一切优秀

成果基础上体现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经济理论体系。新发展理念，就是将以往零散的、个别的发展理念上升为一个有机的发展理念体系，以适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需要，实现了在包容已有经济发展理论优秀成果基础上的重大理论创新。这具体表现在：一是创新发展提出的理论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等构成的有机创新体系，一方面吸收借鉴了熊彼特的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和组织创新，以及西方经济成长理论的技术创新和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创新等创新理论的科学成分，另一方面又超越了熊彼特主要局限于微观领域的企业家创新，忽略了宏观层面的创新如理论创新、文化创新的理论缺陷，强调重大理论创新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对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以及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二是绿色发展提出的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一方面吸收借鉴了西方经济学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科学成分，另一方面又在更高的战略高度上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从而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进一步扩展到保护生产力。三是开放发展提出的双向开放新体系，一方面吸收借鉴了西方经济学国际经济理论的科学成分，另一方面又结合中国的发展阶段和发展特点强调不仅要对外开放国家开放，而且还要对发展中国家开放，不仅要“引进来”，而且还要“走出去”。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从来没有离开过经济学发展的世界文明大道，而恰恰是沿着这条大道推进经济理论的中国化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还是中国学者对经济学发展的世界贡献。

### 创新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最可贵的还在于它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一是构建了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新理论。我国经

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已经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证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因此，我国创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分配制度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一方面冲破了只有私有制才能发展的所谓新自由主义神话，另一方面为发展中国家选择不同的经济制度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开辟了新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成功，将进一步增强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二是构建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新理论。发展中国家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往往会以西方发展经济学提出的理论为指导，但大都没有取得成功，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纷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形成，虽然具有中国特色，但它指导解决的问题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难题，因而具有世界普遍价值。中国从低收入国家向中高收入国家的成功转变，以及在这一进程中形成的发展理论，为处于这一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中国方案和理论指引；中国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而创建的推进从中高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转变的理论和政策框架体系，为那些一直在“中等收入陷阱”中苦苦摸索的中等收入经济体指明前行的道路。

三是构建了发展中国家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新理论。传统工业化面临的是传统农业经济与现代工业经济的二元经济格局，今天的工业化面临的则是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的三元经济格局，这就需要三元经济的发展理论替代传统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提出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理论，就成为发展中国家迎接信息技术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利器。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校长、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教授)